

以 治 学 为 乐

——刘海峰教授学术研究述评

覃红霞

【摘要】刘海峰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史专家。在高等教育研究中，他致力高等教育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解决，努力促进高等教育史学科建设，不断深化高等教育史专题研究。他首创了“科举学”，提出了“为科举制平反”的主张，强调理性评价科举的基本立场。在高考问题上，他主张采取务实渐进的态度，在坚持统一高考制度的前提下进行高考内容、形式等方面的改革。

【关键词】刘海峰 教育学学人 学术思想

【作者】覃红霞，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讲师、教育学博士

韦伯说，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能在这条艰苦的道路上获得发展，不仅需要能力，也需要机会与运气。刘海峰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史专家，在高考改革与科举研究方面尤有建树。命运女神似乎特别垂青于他。1977年，他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成为共和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届大学生；1988年博士毕业时，以一本《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奠定了其学术事业的基础；1992年晋升为教授，1994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成为当时国内文科领域最为年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之一；1992年首倡“科举学”，使科举学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逐渐从“险学”趋于“显学”；在高考研究与高等教育史研究方面，实现了从历史到教育的跨越与融合。作为处在教育与历史交汇点上的学者，他经常行走于人文与社科之间、奔跑于历史与现实之间，从历史到教育、从科举到高考、从传统到现代，以一种“坐冷板凳”的精神追求着学术与精神的享受，虽身处繁华却淡泊谦冲。他几十年游刃于学术、忘情于治学，确非简单的机会与运气可以坚持，而是源自于内心对学术的热爱。“以学术为志业”、以治学为乐正是他所追求的境界。

一、别具特色的高等教育历史与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前身为厦门大学高教所）以其特色鲜明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享誉学界。身处中国高教研究“重镇”，刘教授在高等教育历史与理论研究领域不懈耕耘，在包括“高等教育史学科建设”、“中国大学校史追溯问题”、“传统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变迁”、“高等教育考试”（见本文第三部分）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长期以来，虽然学界对于教育史学科建设的问题论及较多，但对于高等教育史学科建设却鲜有关注。而这一问题不仅对于高等教育史研究影响深远，而且对于高等教育学这一年轻学科的发展也深具意义。针对这种情形，刘教授先后发表《高等教育史学科初探》、《高等教育史学科建设再探》、《高等教育史研究三探》、《在高等教育与历史之间——高等教育史研究四探》等文章，先后对高等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认为，高等教育理论与高等教育历史的关系是互为依存的，体现着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原则，其关系可简单地表述为“论从史出”和“以论论史”。

他认为, 研究高等教育基本理论与现实问题, 如果只顾当前现实问题而轻视历史, 那往往会成为“平面人”; 而当我们对有关高教问题追源溯流、将其来龙去脉考察清楚后, 看到的就不仅仅是二维的平面, 而是三维乃至四维的时空发展过程。这样, 我们的认识就更为深化、洞若观火。针对教育史是姓“教”还是姓“史”的问题, 他认为, 教育史既姓“教”也姓“史”, 更准确的说法是姓“教”名“史”。因此, 对教育史学科而言, 教育与历史两者缺一不可, 没有教育学作指导的教育史研究就可能较为盲目, 而没有历史学作基础的教育史研究则可能会流于空洞。因此, 在教育与历史之间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是使教育史学科更上一层楼的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他还指出, 如果将高等教育学比作教育科学学术之林中的一棵大树的话, 那么高等教育史和比较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管理学、大学生心理等学科则是这棵大树的主要分支或基干。从学科性质和特点来看, 高等教育史犹如这棵大树的主根。而根的事业是默默无闻的, 因此需要高等教育史研究者脚踏实地、刻苦钻研、甘于寂寞, 愿下“十年寒窗无人问”的功夫; 根的事业又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 根深才能枝繁叶茂, 根深果实才能更加成熟甜美。高等教育史研究的对象虽然是过去的东西, 但它的目的是面向未来, 为现实的高教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为预测、规划未来提供理论支持。

对于中国大学校史问题的关注, 某种程度上说, 刘教授既是对高等教育史研究中“微观研究过微, 宏观研究过宏, 较少中观的断代研究、专题研究”现象的回应, 同时也体现了他作为高等教育史学者积极介入现实问题的立场。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 随着几所名牌大学百年庆典的相继举行,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始时间或者说哪所大学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大学的问题引发了学界的热议。对此他认为, 中国高等学校历经六次大变迁, 前四次的变迁分合对许多高校的校史追溯影响很大。大体而言, 凡是校龄在 50 年以上的高校, 很少有从未经过改名、调整过的。这就使得中国的许多老牌大学在追溯校史源头时常常感到头绪纷繁、错综复杂, 客观上容易使一些高校在追溯前身学校或要求恢复老校名时产生纠葛。

对于某些高校在更名过程中所反映出的问题, 他指出, 过去我们对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否定得多、肯定得少、批判得多、继承得少。一些高校也以为越革命越好, 试图与旧时代彻底决裂, 人为地割断校史。这确实不对。今天, 如果我们认为高校历史越长越好、校庆年份越早越好以至一些高校互相攀比, 不是尊重史实、追本溯源, 而是生拉硬扯, 人为地拉长校史、拉长校庆年份。这样也不可取, 甚至还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他认为, 一所高校校史上延能否成立, 关键是看其与前一学校是否真正有继承性。而要考察某所学校与其前身学校是否有连续性、校庆年份是否能够确立, 则需考察人员转移、办学层次、办学思想、学校性质等多方面的问题。对一些以往的教会大学要求恢复校名以及牵涉到中国高教史改写问题的校史上延, 尤应慎重对待。在大学校史标准问题上, 他提出, 应遵循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 坚持统一标准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相统一、强调整体继承性、考察关键因素、留有余地等基本原则。针对院校合并、升格中的更名问题,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将专科学校更名为学院, 将学院更名为大学, 是许多校长梦寐以求的大事。但校名变动必须秉承名实相符、稳定性、可持续发展、尊重历史与兼顾现实、不使用当代人名作校名等基本原则¹¹。怀抱公正、客观的精神, 他主持了多所知名大学百年校史的论证。他一贯坚持的力求“从具体历史条件出发, 不缩小, 不夸大, 本着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 以可靠的史料进行严肃、严密的校史论证, 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等观点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

深入考察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与传统并努力使之与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现实问题相结合, 借此把握中国高等教育变迁的脉搏, 是刘海峰教授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特色。在《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一文中, 他详细分析了中国古代教育的传统与特色。他指出,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早熟性、政治性、人文性三方面特质; 相应地,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也具有如下特征: 产生早而发展迟缓、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偏重高等教育, 官立高校不仅不收费而且向学生提供一定的费用, 以培养统治人才为目的, 与科举考试制度紧

密结合, 实行中央部门办学的高教管理体制, 无宗教色彩, 重人文学科而轻自然科学教育、注重修身养性, 以书院为教育组织形式, 等等。随后, 在《传统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传统文化与中国大学的特色》、《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大学教师的生存方式》、《研究型大学的历史与文化底蕴》等文章中, 针对高等教育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以及高等教育与现代化、国际化、全球化的基本关系, 他反复强调, 要使中国的大学教育赶上发达国家, 需大量借鉴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大学制度和办法, 不过学习外国经验时要考虑中国的国情, 因为在西方行得通的制度照搬到中国来不一定行得通¹²。为此, 必须从中国本土的特色来寻求高等教育问题的解决之道。他说, 如果一味模仿某国教育、甚至提倡“某国化”, 这种做法既不足取也不可能行得通¹³。

刘海峰教授还是国内较早关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精英教育问题的学者之一。2001年, 在人们热衷于谈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候, 他开始反思大众化阶段精英高等教育如何维持和发展、如何处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与精英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他认为, 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 体现了现代教育的公平性。在一定意义上, 精英高等教育对多数适龄青少年是不平等的。但从另一角度看, 大众化时代的精英高等教育仍然体现出教育的公平性。在大众高等教育阶段, 教育机会均等观念冲淡了入学时的英才标准。但是, 要上其中的精英型或研究型大学, 还必然要通过激烈的入学竞争。否则, 精英高等教育的质量就难以保证¹⁴。大众型的大学可以有部分学科朝精英型发展, 而精英型的大学则不一定要兼顾“亲民”, 也就是说不必承担大众化的任务。得到重点支持的研究型大学就不应该再办一些专科层次的高职班或成人函授班, 而应将有限的精力和财力投入到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培养中去。他认为, 要适当控制精英型大学的规模。即使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 精英型大学也应在教学和科研上坚持高标准、不为外物所动。从中国高等教育实际出发, 多数重点大学不仅应该控制规模, 而且还应该缩减本科生的招生数量, 以集中培养高级创新拔尖人才¹⁵。毫无疑问, 这些精辟见解对于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仍有启发意义。

二、为科举制正名, 为科举学奠基

科学研究是一种高度理性的探究过程, 但要开启研究之门也不能忽视情感因素。高考的经历, 知识人的身份, 动荡年代的深刻体验, 都让刘教授对“举子”的命运和左右举子命运的制度杠杆——科举考试倍加关注。“科举时代, 读书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 而参加科举考试通常是重要的转折点。在这龙门关上, 一旦中举及第, ‘鱼’可能戏剧性地化为‘龙’, 而名落孙山则是痛苦难言的经历。由于科举与一千三百年间知识分子的命运息息相关, 古代士人的喜乐哀怒往往集中在科考前后表现出来, 留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因此研究起来兴味盎然, 相对其他专题来讲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加上科举文献汗牛充栋、科举人物难以胜数, 具有很强的挑战性, 以往的研究又存在以偏概全或误解之处, 因此科举学具有巨大的研究空间, 是一门精深引人的专学, 导致我乐此不疲。”¹⁶1992年, 在深刻反思与总结科举制的特点、经验与教训之后, 他认为有必要建立专门的“科举学”。他指出: “没有哪一种制度像科举制那样长久深刻地影响过当时的世道、人心和风俗。唐宋以后科举制在封建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 科举考试成为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内容。科举制不仅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教育、文化、文学乃至社会心理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而且历史上韩国(朝鲜)、日本、越南还曾模仿中国实行过科举制, 欧美国家也曾借鉴科举建立现代文官考试制度, 因此, 科举制的影响是世界性的。科举制颇为独特、影响至深且巨, 其经验教训又有不少值得鉴戒之处, 具有重要性、独特性、广博性和现实性, 所以科举研究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兴趣, 几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建立科举学的目的, “在于将科举研究纳入一个新的学科体系, 使科举研究走向理论化和系统化, 使原来各学科的独立研究更加全面、更为深化, 使国际上的科举研究进一步拓展, 并为现实考试改革提供历史借鉴”¹⁷。以此为界, 他一方面加强了对科举制度与科举史的研究、以问题研究的方式丰富与深化科举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另一方面也注重科举学的研究、试图构建科举学的理论框架

与学科视野。

在科举学（包括科举专题史研究）领域，刘海峰进行了如下探索并提出了独到见解：一是详细考证了科举兴废问题。他在《历史研究》发表了《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一文。该文围绕科举研究的最大悬案——“科举起源”问题，从辨析“科举”一词内涵的演变入手，对科举起源的种种陈说详加辨析，进而提出了“隋炀帝大业元年始建进士科”的论断¹⁸。《唐代秀才科的存废》、《唐代俊士科辨析》、《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科乡试》、《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等文，则细腻而精心地考证了当前科举史研究中的盲点与问题。《科举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争》针对中国科举史上关于“凭才取人”与“分区取人”的争论，指出：“科举史的历史表明，越到后来越是分区说占了优势，而且分区取人的办法还越来越具体，区域配额越分越细，这成了中国科举史上的一个发展规律和趋势。”¹⁹《外来势力与科举革度》等文则分析了外来势力在科举革废中的角色，认为“传教士是从软的方面对中国科举革废施加影响，八国联军则是从硬的方面对中国科举制进行直接的冲击。传教士是以文化渗透的方式影响科举革废，八国联军是以军事暴力方式和不平等条约打击和干预科举制”²⁰。上述研究大多是科举学领域重大的难点、重点问题。他通过严谨细密的梳理、考证阐发新见，影响广大。二是透视科举制度历史与文化影响。“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史料、尤其是稀有史料的发掘，对历史研究的突破具有重要价值，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的《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新探》对此较具说服力。除全面掌握现有资料之外，该文还介绍了新发现的近50种1870年以前记载的有关中国科举的西方文献。文章指出，到19世纪中叶，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已为欧洲知识界普遍知晓。确凿史料说明，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曾受到科举制的启示和影响，“科举西传说”可以确立。他指出，科举制的“公平竞争、平等择优”原则是其被西方借鉴的根本原因。科举制度西传欧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献²¹。在“科举东渐”问题上，他认为，科举制不仅对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东亚的日本、朝

鲜、越南等国也产生了影响。东亚国家效法中国建立科举制，有力地促进了本国文化水平的提升²²。某种程度上说，刘教授对于“科举东渐”和“科举西传”问题的考证，对于重新理解“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做了有益的尝试。三是郑重提出“重评科举制”主张。在系统总结科举制度是非功过、利弊得失的基础上，刘教授发出“重新评价科举制”的理论呼吁。在《科举制是否有值得借鉴之处》、《如今通古看科举》、《科举制平反》、《科举制为何需要平反昭雪》、《科举制百年祭》、《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等论文中，他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科举制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²³。科举被废，并不是考试选才制度很坏，而是特定历史时代的必然结果。科举是废于时而不是废于制²⁴。为科举制平反不等于否定废科举这一历史事件。在1300年的中国科举史上，约有1240年左右的时间是适应当时的时代和社会的。只有当西学东渐、国门被迫打开之后，科举制才日益与时代脱节。科举制在清末被时代和历史潮流所否定，并不意味着这一制度应该永远被否定。²⁵他指出，从历史演变与发展的脉络和基本事实出发，“为科举制平反”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而是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的²⁶。为科举制平反，并不是否认科举制的弊端和局限，而是强调应该冷静客观地评价科举制、纠正对科举制的片面印象，应该对其积极方面加以继承和参考、对其消极影响继续批判与防范，应该认真借鉴其成功的经验、深刻吸取其失败的教训，尤其应该对科举制这一具有千余年历史的重要制度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对废科举这一重大举措进行深刻的反思²⁷。

在专题史研究的基础上，刘教授还致力于科举通史、考试制度通史的研究。在他看来，专题史是个人研究兴趣的反映，体现着个人的学术深度与风格；而通史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体现的是学术研究的广度。由此观之，2002年出版的《中国考试发展史》，结合考试理论最新成果，对隋唐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考试制度发展状况做了全面的梳理和重新的评价。而2004年出版的《中国科举史》既有对科举制度史的叙说又关注了科举制度运作的实际情况以及考试思想的历史发展，在叙说中注重人与制度的互动依存关

系及其交互影响，其用力之宏大、运思之精细可以想见²⁸。

2005年8月，在科举废止百年纪念日前夕，《科举学导论》一书顺利出版。这部洋洋洒洒五十万言的力作，既是刘教授对20年科举研究的阶段性总结、是科举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他本人对科举废止百年的特殊纪念。中国社科院李世愉研究员说：“如果说笔者在此之前尚在观望的话，那么，读完《导论》之后，已是举双手赞成，并愿意加入到科举学的研究者行列。”²⁹教育部考试研究中心前主任杨学为称刘教授“首倡‘科举学’，是很有远见的创举”³⁰。程方平认为，该书“是深孚众望的一部学术力作”，“总观其书的文献充足、考证精当、见解独特、论述规范，足以体现刘海峰作为一名称职的学者在相关研究中的学术积累和学术功底”³¹。该书面世后好评如潮，台湾“中研院”院士、著名历史学家萧启庆教授评论说：“此书为一开创性巨著，有此一书，科举成‘学’必矣！”³²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李弘祺教授在美国出版的英文权威刊物《中国国际评论》上发表书评认为，《科举学导论》“无疑是近年来中国出版的此类著作中最好的一部”，“是综合研究和阐述中国科举制度的历史、实际、意义和影响的最全面的一部中文著作”。

三、高考改革的稳健派

在刘教授看来，科举与高考两相关照，代表着不同时空下以开放报名、公平竞争、择优录取为特征的考试制度类型。从理论上说，考试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才方式，但实际上却找不到更好的可操作的公平竞争方式取而代之，而考试的办法至少可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³³。如果说考试是罪恶的话，那么也是“必需的罪恶”³⁴。在一定意义上，科举有如古代的高考，高考有如现代的科举。科举研究与高考改革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借鉴作用，高考改革对科举研究也有一定的认识作用³⁵。在《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一书中，通过考证研究学校与科举的复杂关系并借助多学科研究成果，他进一步探讨了作为教育考试范畴的科举所蕴含的高等教育考试、学位考试、自学考试和智力测验等特性³⁶。可以说，从立足科举到

研究高考，是刘教授学术研究视野的自然延伸。

在高考改革问题上，刘教授的研究体现出三个特点：一是重视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探讨坚持统一高考的必然性。这体现为以科举为参照，总结与归纳考试的基本规律，从而对高考提供借鉴。在总结了中国社会与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并进一步对照两岸高校招生考试实践之后，刘海峰认为，在重人情、面子和关系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是不宜改统一高考为各校单独招考的，也是难以做到“宽进严出”的。在传统文化未见根本变革的情况下，各校单独招考必将增加权力干预、金钱购买以及高校“低门槛入低门槛出”等现象。只有当中国传统文化不再像过去和现在这样重人情、面子和关系的时候，只有当社会风气出现明显好转的时候，才能减少统一考试分数作为高校录取依据的权重，才能真正做到“宽进严出”，才能保证高等教育的水平和质量³⁷。大学招考改革只有充分考虑文化因素的制约，才能使改革不致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不全面考虑文化国情，全盘移植外国的大学入学制度，可能会因水土不服而难以为继³⁸。二是重视从现实的角度讨论高考改革的基本理论与实践。他认为，不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激进派，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稳健派。稳健派的最主要特征就是从现实出发，理性地对待废除高考的言论，慎重地推进高考改革。为此，他主张要维护统一高考、在统一高考的前提下进行高考改革。他认为，高考就是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如果没有统一考试，就不能称之为高考。世界考试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从分散走向联合，将各高校招生考试中具有共性的部分统一起来，以达到高效、公平和具有可比性。这是考试制度发展的内在要求。³⁹虽然高考的存在也带来了一些矛盾与问题，但高考并非万恶之源，而是各种教育及社会矛盾的集合点。没有高考，就很可能用权力、金钱或关系来竞争。那么，虽然应试的弊端解决了，但其他恶性竞争的问题却浮现了。如果我国高度重视、甚至过度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没有改变，如果重人情与关系的社会氛围没有改变，如果诚信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即使“将高考送进坟墓”，不久后也还得将它重新请出来⁴⁰。他认为，现在的高考除了具有为高校

选拔合适人才、以考促学等教育功能之外，也还具有维护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流动的社会功能。统一高考将原先各校单考中共性的东西集中起来，在经济方面可节约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对广大考生来说也是有益的⁴¹。他指出，高考改革存在着一系列的“两难”问题，如统一考试与考查品行的矛盾、统一考试与选拔专才的矛盾、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保持难度与减轻负担的矛盾⁴²、考测能力与公平客观的矛盾、灵活多样与简便易行的矛盾、扩大自主与公平选才的矛盾、考出特色与经济高效的矛盾等⁴³。归纳起来，上述“两难”的实质是两大类问题，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他主张，高考改革只有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顺应主流民意，才会得到民众的拥护，才会具有长远的生命力。选择与社会物质和文明水平相适应的方式与进度，是目前高考改革应当遵从的现实理性⁴⁴。三是努力澄清高考改革的“认识误区”。作为高考问题专家，勇敢地面对各种质疑并从理论上澄清高考改革的“迷思”，一直是他开展高考研究的重要内容。他认为，高考改革与素质教育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高考制度既有影响素质教育的一面，也有促进学生素质提高的一面。高考的正向功能不应该被其负向功能所淹没。⁴⁵在高考改革面前，学校应主动地应对，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与保持高考升学率两者兼顾。在高考改革日益朝考能力方向发展的情况下，学校要注意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课外活动、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和视野⁴⁶。面对倾斜的高考分数线、高考竞争日趋激烈、高考科目多与考生负担重、追求高考升学率等问题，他指出，本质和根源并不在高考，高考只是使一些问题突显出来而已⁴⁷。高考的竞争、受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社会地位的竞争，是当今越来越激烈的社会竞争在教育 and 考试上的反映。高考制度虽有不同局限，但它能公正客观地选拔人才，对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而言还是利大于弊。他指出，所谓“一试定终身”并非高考制度固有的弊病。高考虽然一年只有一次，但并不是所有人就会被其定掉终身，关键还是看考生的素质和实力、看考生的主观努力和选择。因为一试失利而终身一蹶不振并非高考制度的错误，而主

要取决于考生自己的态度和选择。采用一年一次的考试来决定是否录取新生有其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可以继续施行⁴⁸。在高考制度与诺贝尔奖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中国未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是复杂而多方面的，其深层次原因或根本原因并非高考制度作祟。高考至多只是次要原因，而且高考对人才选拔和民族振兴是利大于弊，实际上最终是对获得诺贝尔奖起推动作用⁴⁹。

刘教授认为，高考是一个影响重大、至为复杂、规模巨大的选拔性考试，是一个“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制度。站在某一种特定的立场去评说，从某一特定的角度去观察，可能所见都是事实、所言也都有一定道理，但也可能会出现盲人摸象、各说各话的情况⁵⁰。他主张，应公正、全面、客观地评价高考，多角度地论述高考、研究高考。总体上看，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应当成为建构高考改革理论的基本方向，同样也是制定高考政策的重要原则。2008年4月，由他担任首席专家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顺利结题并获得通过。在高考改革进一步推进的过程中，刘教授及他领衔的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为决策部门提供了理论参考。

四、“板凳学问”，以学为乐

在学生眼中，刘教授是一个很少休闲娱乐的老师。在他看来，人生有所得必有所失、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要做出真正高水平且能流传后世的成果，除了要有一定的天资以外，非得有坚强的毅力和艰苦的付出不可。而要达到较高的境界，就不得不舍弃一些常人能够享受的乐趣，但却可能体验常人无法体验的乐趣。以学术为乐——坐下来写作，对于以学术为志业的刘教授而言就是一件最快乐的事。他认为，以学术为志业，讲究一种“气”。这不仅意味着有激情而且还体现出高贵的气质，即一种坚韧不拔的顽强气概、一种眼光远大的崇高境界——摆脱了俗事名利、追求“大学问”的境界。

学术人生不仅需要智性的生活，同样需要灵性的生活。而灵性的提升需要有一个澄明的心境。刘教授认为，学术可分为“板凳学问”与

“行走学术”。对从事学术工作的人而言，“板凳学问”与“行走学术”都需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行走”是激发灵感和思绪的一种途径。学术总在交流和碰撞中精进，理论总在研讨与激荡中日益深化⁵¹。在当前整个学术界较为浮躁的情况下，提倡严谨治学、力戒浮躁尤有必要，应提倡“冷板凳精神”，使学者真正将主要时间放在书桌前认真读书、多读慎思⁵²。所以他认为，“行走”要有个度，以便安静地坐下来写大块文章或个人专著。他同时指出，“板凳学问”并不是要大家都去做冷僻的学问，提倡潜心钻研并不是要我们躲进“象牙塔”。潜心钻研与关注现实两方面都不可偏废。不从事艰苦的原创劳动，缺乏淡泊名利的精神，只图方便快捷、轻轻松松地做学问，很难出精品，也永远成不了高水平的学者。论著本身的水平是最关键的。论著是否具有长远的生命力取决于论著的质量，而不是其包装或人为加上光的光环。一本书或一项科研成果如果不是真有价值，请多少名人作序或写书评、得过多少奖励都终将会被时间所淘汰。只有真正具有价值的论著，才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对自己的职业如果只是为稻粮谋，那还停留在“知之”的阶段，肯定不如真正的“好之”者，而一般的爱好者也不如那种以学为乐的人。研究者要想取得成就，就应努力追求以学问为乐的境界，以学术为志业，以做学问为生存方式。他把大学教师大概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名实俱佳者，既出版了大量高水平的论著，也获得了较大的学术声望。此类学者凤毛麟角，属于可能青史留名者。第二类是名不如实者，虽然做出了许多成果但却未得到充分的肯定，不过人们在进行学术史回顾时还会被提及。第三类是名不符实者，虽然当前头上顶着许多头衔和光环，但仔细探究一下其学术论著，却少得可怜。此类学者位居要津或善于造势，但从长远看，在学术史上并不会留下多少痕迹。第四类是名实俱平者，即学术成果与名声都属平平。此类教师在大学中占相当比例。第五类是名实俱无者，学术成果既不足道，也无什么学术名声，但还是在大学中长期任教。此类学者也有存在。想来，追求名实俱佳正是刘教授乐在“板凳学问”的最佳注解，而众多颇具分量的论著则是其追求“大学问”的具体体现。

注释：

16 32 刘海峰、樊本富. 在人文与社科之间——刘海峰教授访谈 [M]. 学术月刊, 2006 (12): 143-148.

潘懋元、刘海峰. 高教历史与高教研究 [J]. 高等教育研究, 1992 (1): 32-36.

刘海峰. 高等教育史学科建设再探 [J]. 高等教育研究, 1995 (1): 39-44.

刘海峰. 在教育与历史之间——高等教育史研究四探 [J]. 高等教育研究, 2001 (2): 70-73.

刘海峰. 高等教育史学科建设初探 [J]. 高等教育研究, 1993 (2): 20-27.

刘海峰. 中国高等学校的校史追溯问题 [J]. 教育研究, 1994 (5): 63-65.

刘海峰. 高等教育史研究三探 [J]. 教育史研究, 1997 (2): 72-77.

刘海峰. 中国高校校史确定的原则与标准 [J]. 中国高教研究, 2004 (1).

11 刘海峰. 院校合并、升格与发展中的更名问题 [J]. 高等教育研究, 2005 (11): 21-26.

12 刘海峰. 传统文化与中国大学的特色 [J]. 青岛化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9 (2): 10-13; 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 [J]. 机械工业高教研究, 1994 (4): 6-11.

13 刘海峰.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J]. 中国高等教育, 2001 (2): 27-29.

14 刘海峰. 高等教育大众化与精英性 [J]. 东南学术, 2002 (2): 57-60.

15 刘海峰. 追求卓越: 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精英教育 [A]. 21世纪高等教育的挑战与回应 [C]. 台北: 高等教育出版中心, 2005: 125-139.

17 刘海峰. 科举学刍议 [J]. 厦门大学学报 (哲社版), 1992 (4): 89-95.

18 刘海峰. 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 [J]. 历史研究, 2000 (6): 3-16.

19 刘海峰. 科举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争 [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7 (1): 153-168.

20 刘海峰. 外来势力与科举革废 [J]. 学术月刊, 2005 (11): 67-69.

21 刘海峰. 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新探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 (5): 188-202.

- 22 刘海峰. 中国对日、韩、越三国科举的影响 [J]. 学术月刊, 2006 (12): 136-142.
- 23 刘海峰. 科举制——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J]. 探索与争鸣, 1995 (8): 41-43.
- 24 刘海峰. 科举停废与文明冲突 [J]. 厦门大学学报 (哲社版), 2006 (4): 69-77.
- 25 刘海峰. 2005: 中国的“科举年” [J]. 教育与考试, 2007 (1): 14-16.
- 26 刘海峰. 为科举制平反 [J]. 书屋, 2005 (1): 4-10.
- 27 刘海峰. 应该如何纪念废科举百年 [J]. 湖北招生考试, 2005 (8): 1.
- 28 吴薇. 科举历史的真实再现——评刘海峰、李兵著《中国科举史》 [J]. 大学教育科学, 2005 (6): 70-72.
- 29 李世愉. 沈浸醞郁、含英咀华——简评刘海峰教授著《科举学导论》 [N]. 中华读书报, 2005-10-19 (8).
- 30 杨学为. 中国需要“科举学” [J]. 厦门大学学报 (哲社版), 1994 (4): 17-19.
- 31 程方平. 创说立学鉴古知今——评刘海峰的学术力作《科举学导论》 [J]. 中国考试, 2006 (4): 11-13.
- 33 刘海峰. 为什么要为科举制平反 [J]. 湖北招生考试, 2005 (4): 1.
- 34 刘海峰. 知今通古看科举 [J]. 教育研究, 2003 (12): 57-61.
- 35 刘海峰. 科举研究与高考改革 [J]. 厦门大学学报 (哲社版), 2007 (5): 64-71.
- 36 谢作栩. “科举学”的新开拓——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评介 [J]. 厦门大学学报 (哲社版), 1998 (2): 120-121.
- 37 刘海峰. 传统文化与高校招生考试改革研究 [J]. 上海高教研究, 1995 (3).
- 38 刘海峰. 传统文化与两岸大学招考改革 [J]. 高等教育研究, 2004 (2): 80-85.
- 39 刘海峰. 高考改革的统独之争 [J]. 教育发展研究, 2006 (11A): 47-59.
- 40 刘海峰. 高考并非万恶之源 [J]. 北京文学, 2006 (1): 125-127.
- 41 刘海峰. 高考改革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J]. 教育发展研究, 2002 (6): 34-38.
- 42 刘海峰. 高考改革中的两难问题 [J]. 高等教育研究, 2000 (3): 36-38.
- 43 刘海峰. 高考改革中的全局观 [J]. 教育研究, 2002 (2): 21-25.
- 44 刘海峰. 高考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J]. 教育研究, 2007 (11): 19-24.
- 45 刘海峰. 高考改革与素质教育 [J]. 红旗文稿, 2006 (17): 9-10.
- 46 刘海峰. 高考改革与学校教育 [J]. 湖北招生考试, 2003 (2): 1.
- 47 刘海峰. 高考竞争的本质与现象 [J]. 高等教育研究, 2006 (12): 27-31.
- 48 刘海峰. 高考并非“一试定终身” [J]. 高等教育研究, 1997 (5): 55-59.
- 49 刘海峰. 高考制度与诺贝尔奖 [J]. 湖北招生考试, 2003 (2): 1.
- 50 刘海峰. 高考改革应稳步推进 [J]. 中国高等教育, 2007 (2): 9-12.
- 51 53 刘海峰. 大学教师的生存方式 [J]. 教育研究, 2006 (12): 29-33.
- 52 刘海峰.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序 [A]. 李均.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 [C].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 董孟怀)